

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 想象与现实

张慧敏

【内容摘要】 在全球秩序动荡与俄罗斯国内政策环境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俄罗斯年轻人对社会及政治发展的看法值得关注。本文以代际划分的方式界定俄罗斯青年，采用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自 2018 年 7 月以来在全俄范围内收集的连续 58 个月的民调数据，探究俄罗斯青年在政治社会偏好上的独特性。2020 年以来，俄罗斯社会在联邦总统和外交政策评价上的代际差异趋于明显。相对其他世代而言，青年群体更多展现出在联邦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间的平衡，更信任司法系统而非宗教。总体而言，青年并非俄罗斯社会最具批判性的群体。当前俄罗斯社会最年轻的“稳定一代”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的态度，比年长的“改革一代”和“千禧一代”更加温和。俄罗斯民众的政治社会偏好更多取决于其经历的社会变动，而非所处的人生阶段。过去几代俄罗斯人对公共事务的基本看法在青年群体中得到延续。相较于对军队和行政部门的较高信任率，1993 年宪法所确立的开放与竞争性政治制度及其关键参与主体至今未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

【关键词】 俄罗斯青年 政治偏好 社会态度 世代差异

【作者简介】 张慧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邮编：20006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6-0101-18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6006

代际的出现与更替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在人类社会，构成一代人的除了年龄这一生理指征，还有近似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文化价值趋向。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的转型历程中，代际变迁更是因参与并反映着群体价值体系的塑造、社会政治情绪的波动以及公民参与活动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们观察俄罗斯社会及政治发展的窗口。

在所有世代中，俄罗斯年轻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看法广受关注。俄罗斯科学院亚多娃·迈娅（M.A. Yadova）认为，当代俄罗斯青年告别了苏联时期的生活，全新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行为模式，也为俄罗斯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① 而随着后现代的认知方式越来越多地进入俄罗斯青年的视野，一些研究者发现文化传承在新世代中的断裂给俄罗斯社会整合带来了风险。在政策层面，2020 年修订后的俄罗斯宪法更是强调年轻人是国家政策中的优先事项。

在国际上，从事社会转型和政治文化的研究者们也关注俄罗斯青年问题。瑞士洛桑大学丹尼斯·达夫隆（Denis Dafflon）等人的研究发现，俄罗斯青年对国家未来道路的充分信任和对个人层面学业及职业发展前景的忧虑相互矛盾，从侧面揭示了转型社会在塑造社会期待和提供机会道路两者间的落差。^② 北京大学王丹彤等人的研究认为，当代俄罗斯青年在政治参与上的冷漠行为，与他们的父辈在转型初期失去明确的政治发展预期和行为价值导向有关。父辈对政治参与的冷漠通过代际传递，致使家庭在政治教育中的责任被忽视，成为集体价值体系断裂的诱因之一。^③ 显然，无论在理论或政策研究中，青年人对政治社会发展的态度已经成为研究者展开讨论并用于解释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学术作品中有关俄罗斯当代青年群体如何看待政治社会发展的内容，从整体上看却充满争议。例如，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① Ядова М.А. «Поколение миллениалов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в поисках другой молодеж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6. 2020. ,С. 181-188.

② Denis Dafflon, “Youth in Russia: The Portrait of a Generation in Transition,” Swiss Academy for Development, 2009, pp. 7-9.

③ 王丹彤、邹文卉、费海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转型——基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与政治社会化视角的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122—134 页。

(Sociological Institute of the RAS) 的斯韦特兰娜·卢里耶 (S.V. Lourie) 认为, 随着俄罗斯年轻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转向后现代, 传统集体身份在青年中的重要性下降, 青年趋于“原子化”, 倾向于将个人的得失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① 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公共行政学院的德米特里·洛吉诺夫 (D.M. Loginov) 通过对俄罗斯社会慈善和志愿活动的考察却得出了相反结果。他发现当代青年是志愿活动中最积极的群体, 说明俄罗斯青年一代依旧拥有高水平的社会团结意识。^② 此外, 在青年如何看待公共机构以及理解社会公平等问题上, 学界得出的结论具有多样性。^③

通过对相关讨论的梳理和比较可以发现,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三点。一是在不同学术作品中, 研究者们对俄罗斯当代青年的年龄划分存在区别。一些学者倾向于强调该群体在年龄上的特殊性, 研究对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 (如不超过 25 岁或者 30 岁)。另一些学者则注重青年群体在社会历史经历上的共性, 以经历的新技术变革或特定社会事件作为划分青年的依据, 如“Z 世代”或者“普京一代”。二是现有作品对青年政治社会观念的考察多停留在对某一类社会事件或特殊时间节点前后的观察, 诸如 2010—2012 年俄罗斯青年抗议行为分析, 或者 2018 年俄罗斯大学生对社会公正的看法。三是一些作品中对俄罗斯青年的考察往往附加对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地区分布的限制, 如 2019 年第七届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大学生的投票行为研究。以上三点的存在意味着, 不同作品中考察的青年实际上是年龄范围及人生经历上都各不相同的主体。透过这类作品, 我们可以得到对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态度及时且细致的了解, 但因考察对象和关注话题的不一致, 很难通过作品间的比较来评判俄罗斯青年在政治社会态度上的长时段动态变化。

通过利用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VCIOM) 2018 年 7 月—2023 年 4 月连续 58 个月的月度调查数据, 本文拟探究俄罗斯青年整体上相对于其他年

① Лурье С.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как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олодеж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4. 2020, С. 31-40.

② Логинов Д.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лодежь в систем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4. 2020, С. 5-19.

③ Петухов В. В. «Поколение «нулевых»: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4. 2012. С. 56-62.

龄层是否存在特殊的政治社会偏好，并考察长时段内其偏好的变化趋势。

一、俄罗斯社会的青年定义与代际划分

俄罗斯学术界将青年单独作为一类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初。十月革命后，面对内部复杂的政局和在国际层面的相关要求，苏联学者们致力于培养理想的接班人。为了全方位了解青年，心理学家、教育从业者和一部分经济学家先后参与到青年的教育普及、职业发展以及文化休闲需求等问题的研究中。赫鲁晓夫实行“和平政策”以来，苏联的青年研究和西方社会学的交流增多。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时期形成的以代际冲突为主的青年社会学研究范式也进入苏联。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青年研究开始与国家和社会的转型等相联系，青年的越轨问题、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等行为转而成为青年研究的重心。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及后现代价值意识的传播，观念、规范、文化等整体性因素又一次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

显然，近代以来俄罗斯社会发展方向经历了多番调整与变化，而青年研究的主题始终与本土社会的主流关切同频，积极适应并参与到俄罗斯社会变迁的主流叙事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理论化。目前俄罗斯学术作品中主要存在三类定义青年的方式。首先是社会心理方向。此类定义强调“青年”是个体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一阶段的成长状况和个人的适应能力。其次是结构功能方向。采用这一定义的作品倾向于将“青年”视为社会中符合特定年龄要求的人口的总体，关注青年群体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是文化方向。此类定义进一步将青年群体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作用单独抽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关注青年亚文化、青年运动等话题，将“青年”视为特定社会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社区。^①这三类定义以由具体到一般，由物质到思想的方式打开了“青年”这一概念，并将其灵活运用到的具体的研究问题中。

^① Елишев Сергей Олегович. «Молодежн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подходы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понятия “молодежь” в социологи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8.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 3. 2017, С. 200-223.

同时，这种灵活性也为比较对照不同作品中的青年研究结果带来困扰。如上所述，社会心理方向的定义强调青年作为个体某一阶段的生命历程的作用，因此针对青年教育及就业等问题的研究，往往习惯采用固定的年龄限制作为划定青年群体的标准。例如，在俄罗斯官方政策文件中明确表示青年是年龄在 14—35 岁的公民。^① 基于这一标准，我们很难回溯、比较在不同年份完成的针对青年的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因为这些作品中谈及的研究对象尽管都叫青年却并非是一批人。当然，除了以年龄为标尺的青年划分，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一种界定青年的方式——代际划分。这种方式以个体出生或步入成年的年份，及该年份对应的社会历史事件分门别类。上述三类青年定义中，结构功能方向及文化方向的作品常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划分青年。将青年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进行研究，并试图讨论这一集体的行为及观念如何随时间波动。在这里，“青年”最重要的特质不仅是年龄长幼，更是年龄的主人身处的时代以及与时代经历相关的记忆。^② 这便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所总结的代际问题的社会意义。青年群体之所以被看重，主要在于人们好奇青年群体如果未曾经历过去几代人的历史性时刻，或身处全新的社会环境时，作为社会未来的主力军，他们的相异的经历是否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偏好，继而引起社会发展路径的改变？

本文所关注的政治社会偏好恰好对应后两种青年定义所关照的范围，故而采用代际划分的方式对当代俄罗斯社会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定位俄罗斯青年。具体操作层面，本文参考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社会经济学教授瓦季姆·拉达耶夫（V.V. Radaev）在《千禧一代：俄罗斯社会如何变化》（*Миллениалы: как меня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一书中对当代俄罗斯数代人的归纳总结，将俄罗斯社会归为六个世代（见表 1）。^③ 本文以个体成年的时间而非其出生年份作为判定其世代类别的参考节点。对个体而言，成年意味着年轻

① 《俄罗斯家杜马通过法令规定青年年龄上限为 35 周岁》，俄通社，2020 年 12 月 24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01224/1032774778.html>。

② Karl Mennheim, “The Problems of Generation (1927),” Republished in Paulkecskemeti (ed.), *Karl Menheim: Eassy*, London: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

③ Вадим Радаев, *Миллениалы: как меня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9, С. 3-41.

的社会成员正式走出家庭的庇护，开始与社会全面接触。因而这一时期的经历和记忆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分量不言而喻，又被称为“印象最深的岁月”^①。此外，俄罗斯公民年满 18 岁方可获得投票权，依法享有独立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如此选择成年时间作为节点也更契合本文主题。

表 1 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代际划分

代际类别	成年时间（18 周岁）
动员一代	1941—1956 年
解冻一代	1957—1964 年
停滞一代	1965—1984 年
改革一代	1985—1999 年
千禧一代	2000—2008 年
稳定一代	2009—至今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该划分方式遵循俄罗斯近代历史“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解冻（Thaw）—停滞（Stagnation）—重建与自由改革（Perestroika and liberal reforms）—稳定（Stabilization）”的发展主线来区分不同的世代。^② 动员一代在卫国战争爆发时开始进入成年期，并在战后恢复期陆续成年。解冻一代在去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期间成年，这一时期苏联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解冻现象。停滞一代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的停滞时期度过 18 岁。改革一代的成年期经历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千禧一代在新千年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陆续进入成年阶段。最后是稳定一代，他们（生于 1991 年以后）从未经历过苏联时期的社会生活，并在 2008 年以后成年。

2020 年，《俄罗斯联邦青年政策法案》将青年的年龄上限提高至 35 岁，因此在本文的考察时段（2018—2023 年），青年包括部分千禧一代和全部

^① Jon Krosnick and Duane F. Alwin, “Aging and Susceptibility to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 No. 3, 1989, pp. 416-425.

^② Семенова В.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к понятию “Поколение”», Россия реформирующаяся. № 3. 2003, С. 213–237.

稳定一代。几年以后，俄罗斯社会的青年是以稳定一代为主。

二、政治社会偏好的衡量与考察

政治社会偏好是个人或集体对一系列政治社会对象的比较评估，即排名。^① 相较于政治文化、价值规范等近似概念，政治社会偏好具有流动性强、相对微观以及便于衡量的优势。偏好的形成有内向与外向两类条件。简言之，只要行为者有一定认知能力且被允许在社会互动中作出选择，那么偏好就会形成，哪怕只有一个行为个体。理论上，随着行为者不断地与环境互动，其对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认识会逐步累积，对各类对象的评估也随之变化并反映在偏好中。如上一节所述，我们对俄罗斯社会几代人的划分，建立在其独特的社会历史经历之上。如此使得代际间的认知基础和互动模式迥异，理论上存在可观察的独特偏好。

现有研究中有不少涉及俄罗斯青年对政治社会发展看法的讨论，但如何系统地建立青年的社会政治偏好的衡量方式仍是难题。来自政治学视角的研究通常习惯引用民调机构发布的报告，作为探讨青年态度时的引证，论证过程重在分析态度发生的背景及其结果，而鲜少讨论所引用指标何以能够衡量青年的政治社会偏好。来自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建立起了对偏好这一考察对象的具体衡量方式，但考察的指标多涉及经济社会变迁，回应的也多是细微的和专业领域的关切。由于本文主要考察长时段内俄罗斯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偏好的变化趋势及其独特性，我们需要综合上述两类视角中的方法。

第一，本文将政治社会偏好分为认知与评价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政治偏好的变化。认知维度反映公众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基本态度，可以用公众对政治社会机构的信任率来衡量。具体操作中，本文选择了总统、地方长官、杜马、司法系统，俄罗斯政党、军队、东正教会、俄罗斯媒体八个公共事务主体进行考察，通过对比青年（稳定一代）和全体受访者对不同部门信任率的

^① James N. Druckman, "Political Preference Formation: Competition, Deliberation, and the (Ir) Relevance of Framing Effec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2004, pp. 671-686.

异同，勾勒俄罗斯青年社会政治偏好的基本轮廓。评价维度则涉及民众对经济、社会、外交政策及个人生活的满意程度。比起对机构的信任，评价是对实时政策的反应，理论上可以观察到更细微的动态变化。

第二，本文拟回顾学界已有的对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几种常见观点，并在结果部分通过分析考察对象在过去 58 个月期间的连续变化，比较本文的发现与常见观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些常见观点如下。

观点 1：相较他们的父辈，政治冷漠现象在俄罗斯青年群体中更为常见，尤其在“大政治”^① 相关的议题中。

年轻公民的政治冷漠现象是西方社会的热点话题。在美国，随着传统社会资本网络的退化，人们担心年轻人正在失去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从而导致民主的衰落。在欧洲，研究者发现承袭自传统工业时代的社会脉络（social cleavage）和以“左右”划分的政治光谱已经难以概括欧洲年轻人的政治立场，青年在选举活动中的投票率下降。^②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政治冷漠研究更关注“民间是否弥漫着对政治机构和国家机器的疏远情绪，”^③ 其通常表现为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和对公共事务的不关心。一些研究发现，相比于经历过早期苏联社会的人，受到转型期的社会失序和主流价值观真空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生的俄罗斯人对政治事务的态度更为冷漠。尤其在面对“大政治”时，更是如此。而上一代人“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其无力承担或漠视对子女的政治教育，以致政治冷漠在代际间传导。^④

在俄罗斯学界，“大政治”是事关共同体安危的政治，“大政治的最高

① “大政治”概念多见于政治哲学著作，尤因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使用而受到关注。尼采批判俾斯麦（19 世纪）的所谓大政治是一种以‘铁’与‘血’做实力支撑、在列强之间维持巧妙平衡的强权政治；称其不是大政治，而是小政治。尼采试图将文化因素纳入大政治的视野。相关概念梳理参见：余明锋，《尼采、俾斯麦与大政治》，《浙江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0 期，第 30—36 页；当代俄罗斯学界及政坛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见后文。

② James Sloam, “Diversity and Voic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3, 2016, pp. 521-537.

③ Петухов В. В. «Поколение «нулевых»: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4. 2012. С. 56-62.

④ 王丹彤、邹文卉、费海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转型——基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与政治社会化视角的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122—134 页。

时刻”是德国政治哲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言的认清并“划分敌友”之时。^①现实中，俄罗斯官方对大政治的理解更趋近国际政治，包括国际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以及大国间相互关系的特点。2020年9月普京在联合国大会75周年纪念会议上提及，“在正式的国家间关系层面缺乏人道主义和善意”；数日后在接受采访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表示“在大政治中没有朋友”^②。普京所言涉及俄罗斯在孤立主义背景下的典型心态。这一立场比较复杂，不能将其理解为俄罗斯不需要朋友，只是相比较而言有共同关切的很少。但综合来看俄罗斯语境中的“大政治”通常指涉及国家及超国家主体的事务，包括事关国家生存的系统化挑战，如安全、经济战略、意识形态选择等。对转型以来俄罗斯青年态度的研究发现，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后，青年群体中最先观察到“与西方对抗”的疲惫感在上升的现象。“青年很快对国际主义的作法变得消极”^③，希望领导层将注意力转回国内。在实践层面，研究者发现自1993年宪法颁布以来35岁以下的议员在国家杜马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93年第一届的17.8%下降至最近一届的6.9%。^④青年议员也主要活跃在青年事务和社会政策部门。在第八届国家杜马中，三分之二的青年议员在议会多个部门的委员会兼任职务，但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在地方议会中的外交和安全事务部门，青年议员仅仅是普通代表。因此，俄罗斯青年群体愈加感到难以在更高层级的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从而产生对“大政治”的疏离感。

观点2：青年正在成为俄罗斯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群体。

这种观点与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新冠肺炎的影响有关。有关研究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年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点正发生偏移。^⑤即社会在发

① Гудков Л., Иллюзии выбора: 30 лет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② ТАСС, “Пути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ет друзей,” 10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tass.ru/politika/9683063>.

③ Самаркина И.В., Башмаков И.С. «Лок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еханизмы конвертации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актики молодежи.»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2. 2021. С. 99-112.

④ Крышгановская О. В., Лавров И. А. «Молодые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и в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2. 2022. С. 45-56.

⑤ Anita Harris et al., “Beyond Apathetic or Activist Youth: ‘Ordinary’ Young People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Participation,” *Young*, Vol. 18, No. 1, 2008, pp. 9-32.

展中持续酝酿出新兴议题，如性少数群体权益、动物保护之类，而青年对此极为敏感。在俄罗斯，新议题传播范围则与区域的差异高度相关，它们常常出现在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民的观察中。根据 2020 年德国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在全俄多地的抽样调查，青年最为关心的话题仍然在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克服腐败、维持体面的生活等方面。^① 从全俄范围来看，俄罗斯青年对议题的偏好未曾超越传统公共讨论的框架。

相比政治上的主张，研究者认为，新一代俄罗斯人和父辈的区别表现在对当局政策的忍耐力和包容度上。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失业和疫苗抗议的研究发现，青年群体更容易对当局的政策不满，或者因理想和现实的差异而走上街头成为抗议者。一方面，比起将自己归于某种宏大的意识形态，千禧一代更愿意透过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来评价政治；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青年自身对抗社会风险的条件更差。15—24 岁的青年非正规就业的比例更高，更易失业。由于乌克兰危机的持续，青年征兵活动也随之而来。^② 社会优先事项的调整，使俄罗斯青年必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对生长于稳定及和平环境中的俄罗斯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观点 3：俄罗斯青年对现代司法系统的看法更加积极。

俄罗斯社会对公正的理解主要受到两种历史渊源的影响。一是“公正”（Spravedlivost）与“真理”和“信仰”一样，承袭自基督教传统的神圣理想，意味着为人处事中需要达到“法”之外的善、良知、正当和热爱。对于追求“公正”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绝对道德（*nравstvennyi absolut*），而不是法所代表的相对价值。俄罗斯社会因此存在将公正与法对立的传统。^③ 前者要求在内部情感上的投入，是一种活生生的公正，而后者只是一种形式。二是“公正”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平等原则相关。^④ 苏联社会提倡各个阶层的

① Lev Gudkov et al. “Russia’s ‘generation Z’: Attitudes and values,”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20, p. 58.

② 《普京签署春季征兵令 将征召 14.7 万人加入俄武装部队》，新华社，2023 年 3 月 31 日，http://www.news.cn/mil/2023-03/31/c_1211962910.htm。

③ 杨明天：《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公平”：语义与表征》，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中国首届“海峡两岸俄语教学与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 年 7 月，第 4 页。

④ 车尔尼什：《俄罗斯社会思想中的公正问题》，载李培林、[俄]戈尔什科夫：《中俄社会平等和公正：比较与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第 57—72 页。

人有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力。苏联解体和市场活力的提升，也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不公正感由此而生。这些情况使得过去几代俄罗斯人很难建立对其司法体系的信任。

相反，俄罗斯青年人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则更为灵活。对一些东亚国家的研究表明，现代司法体系在建设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儒家思想框架下的伦理纲常，在新一代公民眼中“法”的作用正在从维护正义更多转向维护社会秩序。^①人们对法的工具性理解，使得司法信任更容易通过日常实践建立起来。在俄罗斯，相关研究还发现人们对司法系统的评估和实现目标的机会水平相关。相比于中年及老年人，青年阶段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更为平等，这显然为年轻人改善司法评价提供了现实基础。^②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全俄中心”）的民调项目“卫星”（VCIOM-Sputnik）（以下简称“卫星民调”）2018年7月—2023年1月连续58个月持续公开的数据进行调查。

全俄中心成立于1987年，是俄罗斯第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完全由国家控股。多年来，全俄中心的民调数据被世界各国主要媒体及科研机构采用。2017年，全俄中心加入了美国舆论研究协会的透明度倡议，并自2018年秋季起在全球领先的社会舆论数据档案平台“罗珀中心”（Roper Center）官网上发布“卫星民调”结果。^③该调查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搜集数据，按月发布调查结果，月均样本量在4.5万左右。

在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持续背景下，全俄中心坚持按科学标准收集并定期

① 涂敏霞：《市场经济与青年的法律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对广州青年的法律和道德意识的追踪调查》，《青年研究》，2000年第10期，第30—34页。Chan Jin Kim, “Korean Attitudes towards Law,” *Pacific Rim Law and Policy Journal*, Vol. 10, No. 1, 2000, pp. 1-39.

② Воронина, Н.С. «Социальн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 оценк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ых RLMS за 2019 г.)»,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2, 2022, С. 103-108.

③ ВЦИОМ – дон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азы данных Roper Center, https://bd.wciom.ru/baza_dannykh_roper_center/.

更新“卫星民调”的结果。作为官方民调机构，自 2022 年 3 月以来全俄中心也对数据的公开有所保留，将“卫星民调”每月公开的 71 项问答结果下调为 50 余项，但作为有限覆盖俄联邦全境进行抽样采访的民调项目，“卫星民调”至少在反映俄罗斯青年问题的一些结构性特征方面独具优势，因此仍是研究者观察俄罗斯民间社会时需借助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研究选取“卫星民调”数据中受访者对联邦总统等八个公共事务主体的信任情况调查结果，来衡量民众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基本认知。某代人对某一机构信任率的计算方式为：

$$\text{信任率} = \frac{\text{回答“信任”的受访者数量}}{\text{受访者总人数}} \times 100\%$$

本文还选取“卫星”数据中受访者对经济、社会、外交政策及当前个人生活五个方面的满意程度，来衡量民众对社会政治现实的评价。在“卫星民调”数据的原始问卷中，对此五项问题的回答，包括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不满以及难以回答六种答案。为了方便比较，本文采用满意指数反映受访者的满意程度，并根据如下方式计算某代人对某政策的满意度：

$$\text{满意指数} = \frac{\text{满意人数} \times 0.9 + \text{比较满意人数} \times 0.7 + \text{一般人数} \times 0.5 - \text{比较不满人数} \times 0.7 + \text{不满人数} \times 0.9}{\text{受访者总人数}} \times 100$$

由于这里将“一般”的回答进行了积极处理，一旦满意指数小于零，即表示该群体中对某一政策的不满情绪占据主导地位。

四、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代际变化与延续

在这里，本文拟搭建起学界对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各类研究间相互比较的桥梁。包括对比代表俄罗斯青年的“稳定一代”与全体俄罗斯民众对政治及社会发展看法的差异，以寻找青年的特殊性；通过在世代间横向及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比较，分析有关青年政治偏好“特殊性”的结论是否具有延续性。

（一）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基本轮廓

为更好展示 2018 年夏季以来俄罗斯青年与全体民众在政治社会偏好的异同，本文以箱线图展示考察对象对俄罗斯政治社会现实的认知和评价。

图 1 反映的是青年（稳定一代）和全体民众在调查期间分别对八个公共职能主体的信任分布。通过比较两组观察对象箱线图的相对位置，可以发现对联邦总统、政党、司法系统、军队以及东正教的信任程度上，浅色箱体与黑色箱体完全没有交点，说明青年与全体民众对这五个主体的认知出现明显差别。具体来看，俄罗斯青年对联邦总统、军队以及东正教三者的信任程度明显低于俄罗斯整体水平；而面对政党和司法系统，俄罗斯青年表现出的信任则远高于俄罗斯整体水平。如果说俄罗斯社会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大政治”偏好，即对联邦层级的行政主体和军队的信任远高于地方行政主体和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部门，那么青年则恰恰相反，他们在国内与国际事务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稳定一代在过去 58 个月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信任率均值甚至略高于俄罗斯总统。从不同主体的信任情况来看，军队是最受信任的主体，同时获得了青年和全部受访者的最高信任。此外，在青年群体中获得较高信任（下四分之一数等于或大于 50%）的是联邦总统和地方长官，这与全体受访者的结果十分相近，只是少了东正教。与此同时，国家杜马、政党及司法系统的信任水平在两组人群中均明显处于低位。这意味着 1993 年宪法确立的“开放与竞争性”政治制度以及其中关键的参与主体，即使在与这一制度共同成长的稳定一代中，也仍未获得普遍认可。

从图 1 的信任率分布中还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对不同公共职能主体的信任水平波动较大，稳定一代信任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间的跨度往往大于全体受访者。这一差异一定程度上可通过两个观察组的样本容量大小来解释，但也足以说明青年的政治社会偏好更容易波动，他们对变化更为敏感。

图 2 反映的是青年和全体民众在过去 58 个月期间分别对各类政策和自身生活状态满意程度的波动。通过对不同政策的满意指数比较，可以发现超过半数时间里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满意指数都小于零，而外交政策的满意指数从未出现负数。这说明人们对与俄罗斯国内发展相关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满意程度明显低于外交政策，青年在这点上的看法与全体民众保持一致。此外，青年的政治社会偏好整体上更为乐观。通过两组观察对象箱线图的位置可以发现，青年对经济、社会及个人生活的评价略高于或接近俄罗斯整体水平，

唯独对外交政策的评价低于社会整体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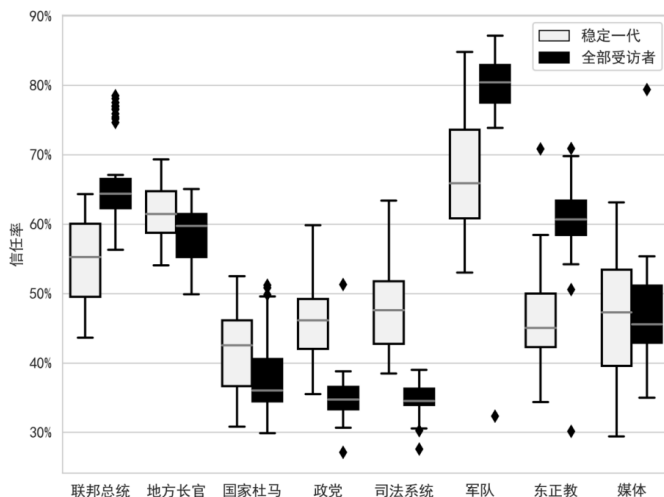


图 1 2018 年夏季以来俄罗斯青年和全体民众对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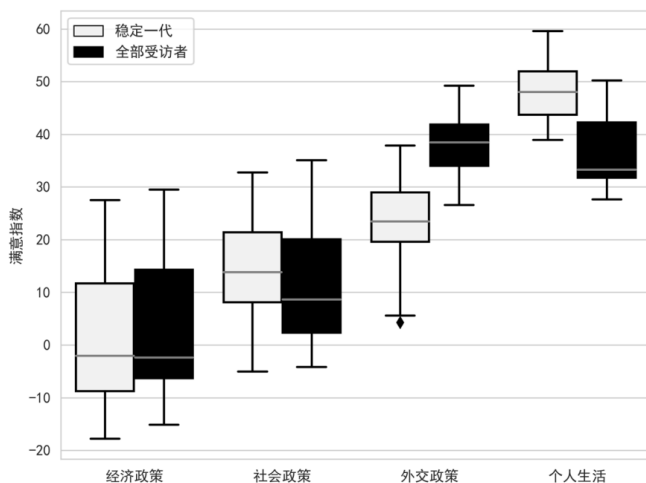


图 2 2018 年夏季以来俄罗斯青年和全体民众对政治社会现实的评价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检验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常见观点

第一，由基本轮廓部分的结果分析可知，俄罗斯青年相比社会整体确实没有强烈的“大政治”偏好，这贴近观点 1 的判断。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一直存在？除了稳定一代，其他几代是否也有可被观测到的独特政治社会偏好？

图 3 是对俄罗斯社会不同世代对“大政治”相关偏好的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到，民众对联邦总统和军队的看法存在清晰的代际差异，具体表现为年长世代对联邦总统及军队的支持率更高。这说明，年轻世代对“大政治”的相对疏离感不仅存在，而且可以逐级传递。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世代在总统信任情况上与年长世代的逐级差异却并非在本文所考察时段的一开始就出现。2018 年夏天稳定一代对普京的支持率还曾短暂超越年长的千禧及改革一代，并在此后一年间与这两代人对普京的信任率同在 60% 左右徘徊。2020 年以后，俄罗斯青年对联邦总统评价的下滑趋势愈加明显，与其他几代的差异趋于平稳。2022 年 3 月，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各世代对总统支持率出现了短暂快速波动，随后这一支持率的代际差异变得愈加稳固。本文将这种分布称为“代际区位”（generational niche）现象，这一区位意味着每代人都在对总统的信任水平的坐标系中有独特的位置。同样，对军队信任水平的代际差异也自 2020 年以来逐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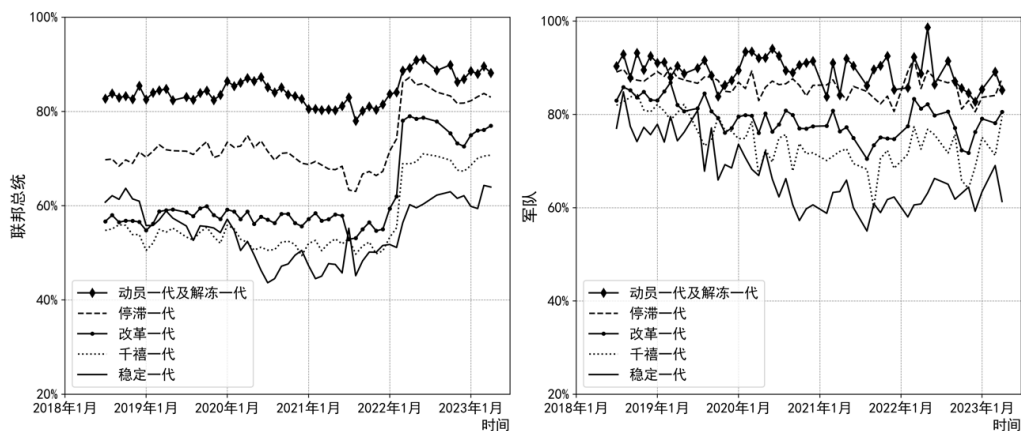


图 3：俄罗斯不同世代对总统及军队信任程度的变化
(2018 年 7 月—2023 年 4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通过基本轮廓部分的结果分析（见图 1）也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青年对司法系统的看法确实比其他世代更积极，符合观点 3 的判断。在更详细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俄罗斯社会对公正的看法同样存在代际差异，具体表现为越年轻的世代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越高，同时对东正教的认可程度越低。这种趋势并非一成不变。在“新冠疫苗接种令”和“居家隔离令”实施期间，稳定一代和千禧一代对司法系统的信任明显下滑，而动员一代及解冻一代对司法系统的认可程度明显上升。直到相关法令取消，年轻人对司法系统信任水平的趋势又逐步恢复上升。这说明对司法和东正教的信任程度并非由年龄的长幼决定，而是由人们与这两类主体的互动有关。年轻世代和现代司法系统一同成长，对现代化法制语言自然更为熟悉和信赖。年长世代也并非全然排斥法的工具化使用，即使有宗教信仰，只要现代司法系统可以维护和体现他们的权利，年长世代也可以通过日常司法实践建立起对现代司法体系的信任。

俄罗斯社会将“法”与“公正”对立的传统正在消解。在目标调查期内，俄罗斯社会在对司法系统信任度下降的同时，对东正教的认可并未上升。随着世代更替和东正教影响力的式微，现代司法系统正逐步成为民众尤其是年轻公民追求公正的主要方式。这种改变也预示着，当现代司法系统遇到问题，年轻民众感到“遭遇不公”时，社会中积累的情绪很难像过去几代那样通过传统的东正教信仰找到出口。

第三，青年是否正是俄罗斯社会最具批判性的群体。通过进一步分析俄罗斯不同世代对社会、经济及外交政策满意指数的月度变化可以发现，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评价最为消极的是改革一代和千禧一代。在考察的 58 个月中，这两代人多数时间的满意指数曲线普遍低于其他几代。如果将经济与社会政策归入国内政策领域，那么在这方面改革和千禧一代更具批判性。这再一次表明，塑造青年政治社会态度的并非年龄的长幼，而是年龄所对应的人生经历。这两代人先后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间迈向人生的 18 岁。与之相比，在 2008 年之后成年的稳定一代显然总体上对当局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评价要更加宽容。因此，在国内政策方面青年并非俄罗斯

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群体。最年轻的一代人的社会政治偏好反倒更为温和，因此观点 2 不成立。

然而，在对外交政策的评价上，俄罗斯社会的代际间差异正趋于明显。自 2018 年夏季以来，俄罗斯民众对外交政策的评价曲线的代际区位现象逐渐清晰，表现为越年轻的世代对外交政策的满意度越低。尤其自 2020 年以来，稳定一代对外交政策的满意曲线在波动中出现持续向下偏移的趋势，并数次接近于零。显然，在外交政策领域俄罗斯青年的独特偏好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比较当前俄罗斯社会所有世代对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的看法，可以发现最特立独行的是动员一代及解冻一代，他们的偏好曲线往往不是最高就是最低。当前俄罗斯社会最年长的这两代人对所有公共政策都表现出超高的满意度。除明显不信任司法系统外，他们对行政及立法机关的信任水平是全社会之最。这两代人在二战及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迈向成年，曾亲身经历“大政治”时刻，对当局的政策也表现得最为包容，与之后几代人形成对比。从这个角度讲，观点 2 应该换一种方式表述。并非青年是俄罗斯社会最具批判性的群体，而是相比当前俄罗斯社会最年长的两代人，此后的新生代都更具批判性。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断俄罗斯公民的包容性正随着老一辈人而远去。无论他们对当局的态度如何变化，多数受访者都对个人生活给予了满意的评价。这种对个人生活持续乐观和包容的态度，几乎没有代际差异，可以视为一种共性偏好。这种在公共和个人生活中的差异化评价，意味着前文所述俄罗斯中青年群体中的批判性，更多是向外的，面向公共领域，并没有进入对自我生活的认知和评价中。

结 束 语

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影响，引起了俄罗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和国内政策的大规模调整，一个更加复杂的图景展现在俄罗斯青年面前。危机正在打破原有的世界秩序，并将建设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历史重任摆到了俄罗斯青年一

代面前，使得他们无论在成长期、融入社会阶段以及在赢得社会信赖阶段三个方面都面临挑战。

外界环境变化对俄罗斯青年提出新的期盼和要求，也产生了他们的社会心态与过去几代人的微妙差异。2020 年以来，俄罗斯青年对总统的评价和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正趋于冷静，相对其他世代而言，青年群体更多展现出在联邦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之间的平衡，同时对司法系统这种尚不完善、需要长期建设的机构给予远高于其他几代的信任。

总体而言，青年并非俄罗斯社会最具批判性的群体。过去几代俄罗斯人对公共事务的基本看法在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延续。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类国家权力中，行政部门获得了最高的信任，对外交政策的满意也远高于当局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在这些共性之下，俄罗斯社会的青年及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间的差异也愈加明显，更多的批判和更少的包容就是这种差异的标志。只是中青代的这种批判性只停留在公共领域，并未影响他们对个人生活的判断。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对个人生活保持乐观。

当然，本文对俄罗斯青年政治社会偏好的研究不过是一个开端。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在本质上是异质性的。^① 尽管在许多学术成果中，青年总是被笼统视为单一研究对象，但是这个群体下还包含着其他子类群。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群体内的异质性如何影响其对俄罗斯政治及社会发展的看法？除了在较长时期追踪俄罗斯青年对政治社会的偏好变化，将来的研究如果能聚焦于何种因素与这些变化相关联，或许会更贴近我们对俄罗斯社会及政治未来发展走向的回答。

[责任编辑：杨立]

① Ядова М. А. «Поколение миллениалов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 в поисках другой молодежи. –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0. № 46. С. 181-188.